

由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易类提要 看汉易经典地位的重构与缺失

张玉春 张艳芳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编纂于清乾嘉朴学极盛时代,体现了乾嘉尊崇汉学的学术风尚。主持编纂《总目》提要的学者,包括纪昀、戴震、邵晋涵等,或为清乾嘉学风的倡导力行者,或受其时朴学学风的陶冶,因此对汉易学的批评,浸染了清朴学的治学倾向和风气。乾嘉汉易学兴盛,惠栋、张惠言等人对宋图书之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廓清,对于汉易揄扬有加。惠栋宗法象数说,张惠言宗虞翻易,亦以取象说为主;焦循等主张在批判中对汉易加以继承。总之,乾嘉易学大家对于汉易均尊崇有加,乾嘉易学最大程度地继承了汉易学的成果。“易类提要”充分肯定了汉易的成就,其评价重构了汉易学的经典地位,然而这种重构也有所缺失。《总目》提要整体上体现了“官修”的学术身份,乾隆的意旨在《总目》提要中都得到落实^①,确有“钦定”的性质和官方烙印。加之“提要”的概论特色,在汉易经典地位的重构中,偏于大同而略去小异,且有因袭《经义考》之嫌,因此其评价不能尽尊为准的。本文拟对《总目》提要对汉易经典地位的重构展开评述。

乾嘉考据学和辑佚学发达,《四库全书》对汉易学文献的保存做出了贡献。《总目》提要著录的两汉易学包括三部分内容:一为《经部易类》著录的汉易2种,分别为宋王应麟辑、清惠栋编的“郑玄注”《周易》。二为《经部·易类》附录的易纬八种,其中多残缺不全。三为《子部·术数略》著录的《京房易传》等。而四库馆臣对汉易的批评,则体现于易类的《小序》及易类提要中,《小序》将易学分为两派六宗,大旨为象数和义理之别。认为易之宗旨乃“推天道以明人事”,并在此思想的指导下,显示了重构汉易经典地位的努力,坚持了其汉易立场,具体表现在如下数端:

一、重视汉易资料勾稽保存,绍承汉学古义古例
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六艺略》著录的易类文献渐次亡佚殆尽,汉易学的经典地

^①司马朝军:《四库全书总目研究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4年,第1-115页。

位由于文献资料的散佚,导致其学术承继的困难。南北朝时期,郑学盛于北朝,隋一统后,北学并于南学,郑注成为吉光片羽。荀爽、虞翻等易学片段端赖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略有存留。《总目》提要认为,《周易正义》以王注为底本,专崇一家,“未为达识”。其中就体现了鲜明的汉学立场。《周易正义提要》评价孔疏云:“不能如诸家正义根据典籍,源委粲然,然则由王注扫弃旧文,无古义可引,亦非考证之疏矣。”^①平心而论,王注在学术上并未尽斥象数,此点已经现代学人特为指出,只因汉学短钉琐碎之失,造就了王学转移学术风气之功。魏晋战乱的频仍及空疏的学术风气,导致了较多汉易文献资料的遗失;后来居上的宋代易学,专凭其义理卓识而凌越于汉学之上。因此,清人对汉易的回归和追寻首先需从文献资料上建立根基,其次表现在学术倾向上的征实古义、遵从古例,这和乾嘉时期重考据的朴学气氛相关。

清学和汉学并非等同概念,清学也并非汉学可以笼罩,清学者中以发扬汉学为己任的大家当首推吴派惠栋。因惠氏一味崇汉不化,被梁启超在其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斥为“凡汉皆好”的愚儒。惠氏继王应麟后,补辑《周易郑康成注》,且著《周易述》二十三卷,《易汉学》八卷,为汉易作注疏,考镜其宗派源流。清学者的学术框架是认为汉易精华皆发明孔学之义,因此《易汉学》不以汉易为限,而是直接追溯到先秦的传统。其《易例》二卷“皆考究汉儒之传,以发明易之本例”^②。惠氏于学问创建之功虽难敌皖派戴震诸大家,但其发扬汉易之功诚不可没。因此,惠氏著作在《四库》中被尊为问鼎汉易门径之作。

《总目》提要对汉易文献尤其是《易纬》八种颇为重视。今见易纬较之众纬书保存了较古的先秦易学思想与资料,东汉末学者如张衡等上疏请绝图讖,后来讖纬之学尽黜,易纬也在劫难逃。《易纬》八种系从《永乐大典》勾稽而来。纬书内容多涉荒怪,但纬书在当代学术视野中似乎须作重新估价,如各类纬书所记述的“元龟衔符”(《黄帝出军诀》)、“元龟负书出”(《尚书中候》)、“大龟负图”(《龙鱼河图》)等,一向被斥为荒诞之语,河图洛书也被认作宋儒的发明。但安徽凌家滩出土的距今 5000 多年的龟衔玉版,证实了纬书的说法是有根据的。《易纬》本同于《汉志》“易阴阳”灾变类书,而《总目》提要将之附录于《经部·易类》,从文献资料保存的角度足见其备受重视。

《总目》提要对《易纬》并未作特出研究,但其评价颇为中肯,如认为《乾凿度》“在纬书之中,特为醇正”^③。李学勤通过比勘《易纬·乾凿度》与孟京易学、马王堆帛书《易传》,认为由帛书中象数思想的萌芽到《乾凿度》的发展,至京房“八宫说”趋于精妙,是一个逐步成熟发达的过程。推阐《乾凿度》上卷的内容可远溯先秦,下卷略当于孟京易学之际,其成书上限至刘

①永瑤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3页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44页。

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46页。

歆三统历的颁布^①。可见,《乾凿度》不似一般纬书的荒诞不经,而是渊源有自,且紧密融合了当时的学术主流。《总目》提要评价《乾坤凿度》曰:“上篇论四门四正取象取物,以至卦爻著策之数;下篇论坤有十性,而推及于荡配凌配。又杂引诸纬书之词,佶屈聱牙,颇不易晓。”其中“四门”见于安徽阜阳汝阴侯墓所出西汉早期式盘。“四正”所取四象、四神,既是四方的代称,也是星宿的象征。在濮阳西水坡墓葬中的“蚌塑龙虎”图案中,已见龙虎二神。可见,四象、四方与占盘的结合在先秦已经形成。因此《乾坤凿度》上篇的内容当承接先秦,而下篇大致为西汉中晚期术数之易的发挥。《总目》提要认为《易纬稽览图》:“首言卦气起中孚,而以坎、离、震、兑为四正卦。六十卦,卦主六日七分。又以自坤至复十二卦为消息。余杂卦,主公卿侯大夫,候风雨寒温以为征。应即孟喜、京房之学……兼通日家推步之法。”评价切中肯綮,认识到了《易纬》对于孟京之学的继承。《总目》提要对易纬的学术性质有精当评价,是出于清初严谨的学风和对汉易文献资料价值的重视,从而将《易纬》附于《经部》之后;与此对比鲜明的是,汉易之显学《京氏易传》已被贬黜于《子部·术数略》,这是出于学术门户的偏见。

《总目》提要对汉易经典地位的尊崇,也体现了征实古义、遵从古例的乾嘉朴学立场。如《周易图书质疑提要》云:“首为古经十二篇,次逐节诠释经义,而不载经文,盖用经传别行之古例。”《总目》提要特别关注赵继序《周易图书质疑》一书,“于经传分合处尤为留意”^②。经传别行的做法肇至先秦,如被尊为“十翼”的《易传》其时大概是单篇流传的,并未附于经文之中。《汉志·六艺略》易类文献著录《易经》十二篇,当为上下经两篇,和《易传》十篇;同时著录了《周氏》、《韩氏》等《易传》七种,即为经传别行的体现,经传合刊,便于观览,这种风气约始于东汉马融、郑玄等经师的著作。《周易稗疏提要》云:“大旨不信京、焦,亦不信陈、邵,亦不取王弼之清言。惟引据训诂,考求古义,所谓征实之学也。”^③王夫之等人一反宋明理学的空疏风习,乃一代考据征实之学的大家,有引领时代学风的气象,体现的是清学风气,遵循的是汉学重古义、明训诂的古文经学的传统。

二、以周孔易学为宗,斥京焦汉易别传

在清经学史的著作中,弥漫着一股分正、变的风气,认为汉初绍承孔门易学的一派为易学正传,而发扬象数之学的阴阳灾变之学为别传,后者以京、焦术数之学为代表。因此《总目》提要对汉易经典地位的肯定是一有限度的,并非“凡汉皆好”,而是要越宋轶汉,直承先秦周孔易学的垂诫示教宗旨。

①李学勤:《易纬乾凿度的几点研究》,《清华汉学研究》1994年第1辑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45页。

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35页。

(一)复“三圣”之旨,以因象立教者为宗。

《总目·易类小序》开宗明义,认为圣人作易之宗旨乃“因象立教”,所以对于清易学那些能“因人事以立象”(《御纂周易述义提要》)的“人事派”极尽褒扬,认为他们得易学之正传。如《日讲易经解义提要》云:“惟即此占象变,敷陈人事,以明法天建极之实功。以经学为治法之义。”又《丰川易说提要》云:“阐发易理,乃取诸人事,谓阴阳消长,不过借作影子,特为切实。”^①诸如此类,不一而足。《周易》作为五经之首,其“因象立教”宗旨的提出,源自《周易·大象传》以卦象象征君子、先王之德的思想。如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、“雷出地奋,豫;先王以作乐崇德,殷荐之上帝,以配祖考”等等。《大象传》以《易》见圣人之情,对各卦思想的提炼,都着眼于其正面积德的德行意义,具有诫谏占筮者的作用,反映了先秦理性思想的张扬。《总目》提要阐扬因象立教、归诸事理的大易精神,远溯至儒家“正传”的易学,这和孔子“不占而已”、“持其德义”的卜筮思想是一致的。

《总目》提要宗法“因象立教”的易学思想,与乾嘉乃至有清一代的易学主流思想一致。胡渭《易图明辨》乃辨伪学上的杰作,对《周易本义》、《易学启蒙》所附之图考辨源流,订正讹误,攻宋学甚为有力,影响巨大。《易图明辨提要》云此书:“引据经典,元元本本,于易学深为有功。”^②此书对宋易图学的考辨到了无须再辨的境地,梁启超对胡渭之书给予极高评价,认为渭书一举将宋学拉下圣坛。梁启超云:“渭之此书,以易还诸羲文周孔,以《图》还诸陈、邵,并不为过情之抨击,而宋学已受‘致命伤’。自此,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,孔学自孔学,离之双美,合之两伤。自此,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,舍宋人外,尚别有其途。”^③清代学者所抨击的“宋学”乃宋之图书学,对于秉承孔门《易传》的义理之学推崇有加,戴震曾言“《周易》当读程子《易传》”^④。清末学者皮锡瑞认为,程子《易传》不信邵雍象数之学,专讲义理,最为纯正^⑤。程氏《易传》无论从阐释方法上还是思想上,都继承了“十翼”以儒家德行解易的门径,直承先秦孔门易学,从而受到戴震等人的推许。可见,《总目》提要对周孔易学的尊崇,代表的是清代易学史上的主流观点。

(二)肯定“汉儒言象数,去古未远”,坚守儒家易学正传

西汉象数易学,在先秦阴阳五行思想的框架下,融入了崭新的内容,其中阴阳灾异、五行九宫、飞伏世应等大都为汉人独创。刘大均认为:“李氏《集解》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43页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40页。

③梁启超: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4年,第144页。

④段玉裁:《戴东原年谱》,载《乾嘉名儒年谱》(第五册)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6年,第301页。

⑤皮锡瑞:《经学通论》,中华书局,1954年,第229页。

以马融、荀爽、虞翻注的文字最为完备。由其注经注传的文字以及后人的研究文字形成的汉人象数易,其‘象数’的涵义已与最初的象数绝不相同矣。”^①《系辞》记载“大衍之数”节是对《周易》占筮之法的说明,所谓“四营十八变而成卦”。由《左传》记载的筮例可见,春秋时期的象数概念还很朴拙,如僖公十五年记载韩简云:“龟,象也;筮,数也。物生而后有象,象而后有滋,滋而后有数。”此处之“象”是龟象,“数”是筮数,并不神秘。《周易》本为占筮之书,战国末年大概受到齐地方术之学的影响,至西汉将“大衍之数”同音律、星宿、灾异结合起来,构成了一个精密的预测系统,就大大超越了先秦象数的藩篱。

四库馆臣认为“汉儒言象数,去古未远”,言外之意是将京焦象数易学排斥在外,肯定观象说、变爻、消息卦、互体等,并以此来否定先天图、河图洛书等宋易发明。如《大易通释提要》云:“河图洛书,只可云其理相通,不必穿凿附会。谓先天图,非生卦之次序。论爻谓:当兼变爻。谓泰、否、损、益四卦,为上下经之枢纽,皆具有理解。惟不取扶阳抑阴之说,则未审姤、复之初爻矣。”^②《总目》提要中提倡的变爻、四卦枢纽说及扶阳抑阴的说法,在先秦易学发展脉络中皆有痕迹可循。“观象说”起于《系辞》“圣人观象以制器”的说法,而且在《说卦传》中罗列了大量的易象,都体现了先秦易学对卦象的重视,在《左传》的《周易》筮例中也有系统的卦象说,如坤为土、为母,艮为山、为门庭,震为长兄、为车、为足等等。以变爻占筮更是先秦筮史官学系统的主流。《左传》二十余例以《周易》占筮的筮例,一爻变的筮例占大半,周原甲骨等出土数字卦所见筮数也可见两组数字并列的情况,经今人研究可能即为变爻之例。《总目》提要所言泰否象征君子小人之消长,大来小往之反复;损益两卦所暗含的损上益下之人道精神,在《系辞》及马王堆帛书《易传》的孔子言论中均见端倪。而“扶阳抑阴”之意更是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在《周易》哲学思想上的折射。经今人研究,消息卦、卦气说和互体等在先秦也有踪迹可循^③。可见,《总目》提要所提倡的汉易象数,亦只是在先秦易学中为《左传》筮史、孔门学者所提倡的“象数”,而非后来京焦发展的西汉易学,所言“去古未远”也只是虚晃一枪的搪塞,其本意在回归先秦周孔之易学正传。

(三)辟方技末流,黜京焦小术,阐周孔筮法

《总目》提要肯定了朱子“《易》本卜筮之书”的提法,这是因为孔子确曾用《周易》占筮,在《系辞》中“大衍之数”节也保存了《周易》的筮法。《总目》提要对古筮法的倡导,其意图有二:其一,阐扬周孔大道,以示垂诫之教。《先天易贯提要》云:“圣人准天道以明人事,乃作易以牖民。理无迹,寓以象;

①刘大均主编:《百年易学菁华集成·前言》,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2010年,第8页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39页。

③有学者认为,先秦孔门弟子子夏问易的资料中已见卦气说。参刘彬《子夏易学考》,《周易研究》2006年第3期。互体之法见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。

象无定,准以数;数至博而不可纪,求其端于卜筮。而吉凶悔吝,进退存亡,于是见之,用以垂训示戒。”^①易之象数体现天地大道,圣人以占筮寓吉凶进退,以象数明事理,从而实现牖民圣治。其二,以圣人卜筮之术寓天道人事之理,来反对宋学末流的“束书不观,游谈无根”的空疏学风。如《先天易贯提要》云:“三代以上,无鄙弃一切空谈理气学问也……曰蓍曰龟,经有明文;曰揲曰扚,传亦有成法。岂取尽性至命之书而褻而玩之哉!”^②《先天易贯》一书侧重卜筮之法,《总目》提要言其借蓍龟立辞,非空谈理气学问之书,批驳了宋学末流游谈无根的治学态度。

四库学者认为“易至焦、京而流为方术”,这也是清初学者的普遍看法。但《总目》提要并不反对揲蓍之法、占筮之术,认为占筮关乎圣人宏旨,而京焦只是方术小道。如《周易筮述提要》云:“以朱子谓《易》本卜筮之书,因作此编,以明其义。凡十五篇。虽专为揲蓍而作,然辟焦、京之小术,阐羲、文、周、孔之宏旨,立论悉本经义,与方技家所说迥殊,故进之列于易类,不以术数论焉。”^③这种思想与《汉志》尊崇占筮的思想有一致之处,不同的是,《汉志》将专言占筮古法的书籍斥列于《术数略》,而《总目》提要则将之晋升于《易类》,反而将《京房易传》这一西汉之显学黜落于《子部》,这是四库馆臣的崇古思想在作怪。

《总目》提要“以孔子十翼为主,定众说之是非”,如《周易传注提要》:“其说以易卦本以人事立言,陈抟、刘牧诸图,皆使易道入于无用;参同契、三易洞玑之类,皆以异端方技阑入经学;即汉儒卦气直日之类,亦经外别生枝节。故惟以观象为主,第不废互体耳。”^④《经部·易类小序》所言易学发展之两派六宗,大多为易学别传,道家之虚无、方技,汉儒之“入于讥讟”,节外生枝,离圣人之易远矣,皆在摒弃之列。《小序》认为,“易之为书,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”,“其余皆易之一端,非其本也”,“兼收以尽其变”^⑤。又如《周易孔义集说提要》云:“则以为陈、邵之易,非孔子之易,概从芟薙,持论特确,所解亦多能推验旧诂,引申新义。”^⑥这种尊崇圣人之学的思想,既是汉以来儒家学者以经书为圣人之书的延续,也是《总目》提要“钦定”御书的思想标签的彰显。

三、汉易经典地位重构中的缺失

四库馆臣在重构汉易经典地位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,但由于他们只是看到了孟京易学对于《火珠林》等占筮之术的影响,将汉易发展过程中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76页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76页。

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37页。

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40页。

⑤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1页。

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42页。

的趋新之学目之为占卜方术,因而对孟喜、京房等人过分贬低,是一大缺失。

汉学经师固守家法,但孟京一系对易学的改造却不遗余力,孟喜甚至被汉宣帝斥之为“改师法”而不立博士,可见其新变的力度。孟喜自称从田王孙处得到《易》家候阴阳灾变书,京房易学得之于焦延寿,与孟喜本为一系,京房整理并继承了孟喜的学术,由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的《孟氏京房》、《灾异孟氏京房》等书可见一斑。孟京易学以阴阳五行论说灾异、探讨天人关系,是两汉流行的政治神秘主义思潮的重要部分。京房所创之八宫卦、纳甲、卦爻五行、星占、灾异占及孟京之卦气说等,在汉代及整个象数易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,是汉代易学新变之代表。随着东汉谶纬之学的兴盛,《京氏易》的内容被纬书公然传抄,并借之得以部分保留;东汉郑氏易、荀爽易学、虞翻易学等在主体易学思想与基本原则上,大都本之京房易学,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。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都受到孟京易学的影响,可见孟京易学在整个汉代易学的重要地位。四库馆臣由于重视易纬,因而对易纬中所保存的孟京易学内容也是比较重视的,但对孟京易学义理本身的态度则是有所保留的。

其实,《总目》提要的看法,与清代整个易学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。有清一代学人对孟京一系的易学,多以“别传”之名冠之。如皮锡瑞《经学通论·论阴阳灾异为易之别传》云:“经学有正传,有别传,以易而论,别传非独京氏而已,如孟氏之卦气,郑氏之爻辰,皆别传也。又非独易而已,如伏传五行,齐诗五际,礼月令明堂阴阳说,春秋公羊多言灾异,皆别传也。”^①以“阴阳灾异说易”,皮氏以之为易之别传,举凡汉经学之阴阳五行说,皮氏均以“别传”论之,可见其对于汉代阴阳五行学说渗入儒家学说的清醒认识。西汉讲求灾异的术数,企希达到儒家天人和谐的政治目的,但清人评论多着眼于其占卜之数,而忽略了其天人观念、五行思想对后代的影响,如清唐宴评论京房易学:“易之有京氏,犹诗之有齐诗也。其说初以阴阳五行说易,后遂纯以占验说易。由东汉一代京易大行,以其说近乎谶纬也。故东京凡以明易征者,多方术之士。至此易道且为别传矣。”^②余敦康先生认为,《京氏易传》一书确立了汉易象数学的理论基础与思维模式,将易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,且对后世整个易学产生深远的影响,体现了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,仍属于经学范畴^③。当然,京房的政治哲学建构在神秘主义的基础之上,最终作茧自缚,也是时代悲剧。王夫之论道:“盖房之为术,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数,天地之化,且受其割裂,圣人之教,且恣其割补。道无不圆也,而房无不方,大乱之道也,侮五行而桷二仪者也。”^④王夫之认为京房易

①皮锡瑞:《经学通论》,中华书局,1954年,第18页。

②唐晏:《两汉三国学案》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44页。近人尚秉和先生更尽力主焦、京易学即孟氏学,而孟氏学乃孔门嫡传之易学。《焦氏易詁》卷一,民国二十三年北京刊本。

③余敦康:《京房易学的象数模式与义理内涵》,《周易研究》1992年第2期。

④王夫之:《读通鉴论》卷四,中华书局,1975年,第97页。

学以象数体系割裂了天地大道,恣意削补圣人教诲,以机械适应八宫、世应的象数模式,只是对阴阳五行思想的拙劣应用。可见,有清一代学者已跳出汉易学特有的神学神秘气氛,更注重以易理体现的哲学思想、儒学精神来为现实立教,殊为难能;但是他们囿于实践理性、工具理性的紧迫使命,没有关注到汉易的新变以自然哲学为根柢,为易学建构出一个包纳宇宙洪荒的体大思周的思想体系。因此,清代学者对汉易的评价是存有偏颇的。

清乾嘉学者的精英在著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时秉持了为经学求真、为现实立教的儒者气质,未能超越其学风的质实与偏执,而且在《总目》提要撰写中须瞻顾圣意,因此在经学提要中体现了更多的上层意识形态。由于没有对汉易生成的社会氛围有切身体会,因此在对汉易经典地位的重构过程中必然有隔膜之处,《总目》提要对汉易的评价略存疏失,这更多是缘于时代所限、身份束缚的结果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暨南大学

·本刊启事·

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 CNKI 系列数据库收录,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。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,请来稿时向本刊声明,本刊将做适当处理。

《文献》杂志编辑部